

大数据时代网络抗争治理

——基于江苏启东事件的个案研究

刘淑华

[摘要]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社会抗争具备了与传统时代不同的特点,即它不再具有固定组织结构与形式,不再依托固定意识形态来加强与成员之间的纽带,甚至组织成员都不再固定。借助互联网,抗争成员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与网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相关议题进行直接意见交换和讨论,一旦意见统一就产生强烈的抗争意愿,而兴趣消失或者议题解决后,这种短暂的虚拟社区和松散组织就很快消失。这些新的特点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也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江苏启东环保抗争为案例,分析了大数据时代抗争运动新的特点,并为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和治理提出建议和对策,同时指出了我国在大数据时代前瞻性预测与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

[关键词] 大数据; 国家治理; 网络抗争; 网络危机治理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5)07-0121-05

一、传播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抗争运动的进化

公众政治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和过程的研究最早始于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对“积极主动的公众”的研究分析。^[1]他认为参与政治的公众区分为“激动可控的人群”和“理性反思的公民”两类,而人的政治参与决策往往最终是在这两个群体身份转变的反复过程中由社会影响决定。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瑞尔森和赫泽·戈德特(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指出,选民政治参与决策依赖意见领袖的影响。^[2]埃尔默·沙特施耐德则认为(Schattschneider)公众政治决策更多忠实于所在政党的意识形态,选民本身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做出理性决策。^[3]可以说,包括艾力特·弗里德森(Friedson)、艾利赫·卡茨(Katz and Lazarsfeld)、海罗德·拉斯韦厄(Lasswell)、拉尔夫·特纳和路易斯·凯里恩(Turner and Killian)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多名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学派著名政治心理学家都认为,公众是“被动的、无自我思考能力的大众传媒围观者”,多数不具独立思考能力,完全依靠传媒信息引导选择政治决策。

20世纪30年代随着各国政府对电视为主导的大众传媒宣传手段的成熟运用与控制,伯纳德·克翰

(Cohen)深化了对大众传媒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和公众主动选择形象的理解。他认为电视等传媒渠道无法影响人们怎么做政治决策,但可以引导人们的关注点。菲利普·康沃斯(Phil Converse)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提炼总结,提出新理性选择政治决策模型。^{[4][5]}指出公众在政治决策时会积极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大众传媒、个人交流、团体网络等)全面搜集相关信息,并联系个人利益进行理性评估。而著名的诺贝尔政治决策学家赫伯特·西蒙更进一步指出政治决策正是这种理性评估的结果(Simon)。^[6]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大量使用,信息爆炸问题凸显,公众面对海量信息和数据,再像理性选择政治决策家假设的那样全面评估候选人已不可能。乔治·马库斯和拉塞尔·纽曼(Marcus et al; Neuman et al)经过对美国选民选举决策的大量分析后提出了公众情绪智力决策模型。^{[7][8]}这一模型指出人的政治决策和思维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人会根据面临的决策调整决策模式。当所面临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对做出的决策具有信心或由此带来的情绪比较愉悦时,人通常会遵照惯性思维模式进行例行决策,不再进行额外信息搜集与分析;但当政治环境比较陌生,对所做决

作者:刘淑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策缺乏信心且后果会直接威胁到切身利益时,人们会变得比较焦虑,提高警惕进入“监控”模式,对相关政治信息进行大量搜集、过滤、整理、分析,然后谨慎做出决策。而互联网的出现和大量信息的传播为公众的理性决策和情绪智力决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21世纪初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伴生的政府信息控制能力下降促使戈林·斯佐德霍夫和他的研究团队对公众情绪智力决策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公共系统理论(Strodthoff and Kiouisis, 2010)。他们认为在社交媒体严重冲击传统大众传媒主导地位的大数据时代,某个政治话题要从个人关注热点转化为群体行动核心和关注热点,必须经过三个阶段:(1)歧义消除期:这个阶段社会抗争的原始动因必须从传统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海量热点话题中脱颖而出,参与抗争的成员必须在自由互动的平台上(多为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对抗议议题进行充分讨论交流,完成抗争运动基本宗旨和原则的清晰定义。(2)议题合法期:由大众媒体传播渠道主导,体现在传统传媒守门人/信息过滤器对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议题本身及公众对议题关注合法性的(主动或被动)认可上,并愿意在主流媒体渠道上进行传播。(3)交流常态化:这个阶段抗争运动完成了从互联网的自发传播到权威媒体关注的常态化议题的转变,由传统传媒固定团队对议题进行介绍、传播与进展更新。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通过传统媒体或社交媒体对议题进行追踪。

本文借鉴公众情绪智力决策模型对互联网时代个人政治决策模式的分析,以及社交媒体时代公共系统理论对抗议运动核心议题传播模式的解释,并对两个模型进行了修正。公众情绪智力决策模型无法解释单个公众情绪变化为何最终上升到了群体抗争行动。而这一解释力恰恰是公共系统理论力图加以解决的。然而,公共系统理论过分强调传统传媒和精英的信息过滤对群体行动形成的强大操纵力,认为只有经过权威传媒的传播和正式传播渠道的认可,源于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群体行动才能最终发展完成,而对单个公民的关注热点如何转化为群体行动的形成机制和过程只是一笔带过,似乎只要权威传媒完成事件宣传,群体行动的酝酿成熟就自然完成。本文的修正在于,首先,网络抗争运动发展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关注,但却不完全取决于单个公民个人的情绪变化。其次,本文力图通过对启东事件的分析,来解释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上的个人关注热点是如何转换为实际的群体行动的,对这一转换过程、传播机制和发展影响因素做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力图准确说明江苏启东事件反映的大数据时代网络抗争新特点及地方政府的应对挑战。这对于理解大数据时代我国的网络抗争,为地方政府有效的应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二、江苏启东网络环保抗争过程

江苏启东事件是近年来社会公众和地方政府经过

数年多次沟通和努力最终实现公共事件和平解决的典型案例之一。参与人数远远超出以往所有抗争事件的规模,该事件堪称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城市大规模环保维权运动。社会公众首次对市政府的占领,可能标示着我国社会抗争运动正逐渐由农村边缘地区向城市扩散。该事件也是我国公众自发主动运用新媒体和网络进行诉求表达、意见沟通、组织协调以及网上网下行动指挥体系建构的第一个环保抗争运动。因此对本案例中新技术的运用方式和公众政治行为决策过程的研究对于地方政府大数据时代抗争事件治理具有参考意义。

2003年6月,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决定在南通开发区投资建设大型造纸项目(以下简称王子项目)。2005年4月王子项目正式领取营业执照。此后启东环保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公众个人反思期(2006年8月-2010年2月)

2006年8月,首个关于王子项目可能对威胁启东沿海滩涂养殖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网站,援引当地报纸项目获批的新闻报道,指出该项目对启东和下游地区环境影响深远,质疑地方政府引进污染企业的动机。网友有梦最美开始在其博客和启东门户网站“启吾东疆”论坛上发表抗议,并建立“关注启东”QQ群。

2009年9月,天涯网友发帖指责引入王子企业的决定。环保主义者以启东市民名义,向南通市长信箱致信,希望政府对王子排海工程做公开科学的解释。10月,慧聪环保网一篇名为《日本王子纸业将排污启东》的帖子被天涯、百度、人民网、凤凰网、千龙网等大量转载并引起热议。这时帖子内容和环保运动开始时有很大差异,重心转向详细解释反对污染造纸企业进入启东的原因,引述法律规定系统阐述污染企业引进给当地带来的灾难后果。他们在各大论坛大量转发该帖,寻找主流媒体、成功人士、全国人大代表联系信息。

(二) 网上网民集体沟通反思期(2010年2月-2012年6月)

2010年2月天涯出现疑似官方回应说明网帖《江苏王子制纸项目、达标水排海工程基本情况说明》,介绍王子项目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具有循环经济型特点、王子企业环保水平高、投资规模大、带动性强等)。指出项目建设符合当地经济需要,对渔业和生态影响在可接受范围。2010年5月-10月间,网友再次在天涯发帖,质疑疑似官方回应贴的解释,呼吁公众加入启东抗议行动指挥部和公开QQ群,保护生存权。微博账号@同城启东也于10月初在新浪微博发布大量王子项目污水处理图片,侧面佐证对官方的质疑,要求地方政府做出详细解释。2011年初南通政府决定将排海工程停工,这被环保主义者视为阶段性胜利。

2012年4月18日启东市成立南通大型达标水排海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领导小组,目的是为了“确保排海工程

顺利进行”。2012年5月11日网友有梦最美再次在启吾东疆论坛上发帖,将领导小组成立消息向公众发布。

(三) 网上网下意见融合期(风暴眼)(2012年6月-2012年7月)

从2012年6月开始,环保主义者加强街面宣传,依照排海管道走向,访问沿途村镇,递送广告传单。少数村委会对运动表示支持,并组织村民进行座谈。在启东城里的街面宣传则将晨练老干部做为宣传主要对象。与此同时,网上宣传也如火如荼,从5月底到6月8日,网友连续发布图文并重的微博指责政府重启排污工程,呼吁民众采取行动,拯救家园。这些微博被大量转发,引起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质检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财经网等主要媒体关注并进行了报道。6月9日上午环保抗争者再次组织环保街面宣传,大批启东市民自发参加。

6月18日,启东政府除派出代表接受抗争者请愿书,还组织了各方参与的交流沟通会。在会上,老干部率先质疑了引进王子项目和选择启东作为排污口的决定,建议政府对王子生产业务进行限制,最大程度降低污染影响。交流会各方最终未能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7月20日,网友“有梦最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向当地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随后大批民众在当月28日、29日、30日游行示威抗议了日本王子项目排污启东。26日启东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启东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名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

(四) 网下抗议示威爆发期(2012年7月28日)

28日上午,抗议示威爆发。同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宣布,永远取消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

启东事件在环保运动初期,公众热情并不高,那么为什么最后这起网络热点事件会演变成为一场跨媒体、跨人群、跨年度的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呢?网络和社会媒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联合对大数据时代的环保运动起到了什么作用?

事实上,在公众个人反思阶段,不管是在启吾东疆、天涯等网络论坛,还是在微博上都未形成对该事件的足够关注。不过,地方政府的“信息缄默”使自身错失了权威的信息发布地位。从网络论坛讨论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公众关注的重点在“为什么要立项”上。而从公开信息来看,整个项目从决定引进到最终立项,地方政府从未就这个问题与公众进行过沟通,而是以“项目获批”的报喜方式通过传统媒体的新闻渠道单向通知公众。由于信息不公开,导致网民对该项目立项过程和决策依据的怀疑和不解。

虽然随后公众个人或团体多次致信市长信箱或向司法机关申请项目信息公开,但均未获得任何回复。而正是由于这种信息不透明,启吾东疆论坛上大部分网民加大与环保主义者的自发交流互动寻求新的信息通道。地方政府则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保持缄默,慢慢丧失了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先机。

相比之下,环保主义者在整个运动进程中充当了

本应由地方政府部门担任的“早期预警(传播)者”和舆论领导者的角色。^[9]一方面,他们在不断的与地方政府互动过程中得到更多信息,早期通过网络论坛和微博将这些信息与更多公众分享。后来则联合通过现场宣传、互动讨论和散发传单的形式为急于了解项目内容的公众提供相对稳定的信息通道,渐渐获得了公众的依赖和信任,缓慢但有效地获得了本应由地方政府部门担任的权威信息发布者地位。另一方面,一旦信息权威发布者地位确立,更多网友和社会媒体使用者便自发将自己掌握到的信息提供给这些运动领导者,扩展了信息内容的丰富程度,提高了可信度,建立了信息交互和积累的良性基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人做为公众权威信息提供者的地位。

在网民集体沟通反思阶段,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无法与网络审议支持下的网民意见协调一致。2010年2月,地方政府尝试通过天涯上疑似官方项目说明贴《江苏王子制纸项目、达标水排海工程基本情况说明》来争取主动,说服公众接受项目。在这篇帖子里,地方政府详细解释了王子项目的选址决定、项目的环保技术水平与废水排入黄海问题、项目废水排放口选址启东及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渔业生产的影响、排海管道运行的监管及对我国木材资源的消耗以及项目在日本国内召开年度道歉会的起因及问题的前置预防。

不过,地方政府的这次信息公开不但没有争取到主动,反而使公信力降到运动开始以来的最低点,主要原因:(1)不恰当地选择信息公开渠道。伊丽莎白·诺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在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中指出传播信息通道公开性越高,越容易被当作多数或者优势意见,从而影响受众对信息内容可信度的判断。^[10]地方政府原本通过新网络媒体进行信息公开可以视为政府在政民互动的创新尝试,但是这种感觉神秘、非公开的网上不记名发帖方式让网民直接质疑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政府决策的不自信与信息公开的诚意;(2)缺乏掌握新网络媒体的自信,缺乏互相交流的意愿。天涯发帖内容中虽然就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阐述。但对网民来说,一方面虽然可以从网帖中得到部分答案,但更多问题的涌现使公众更加渴望与地方政府全面互动交流,而政府匿名发帖后的完全静默使网民倍感挫折;另一方面,网帖明显并未对网民之前发布的大量建议和意见进行分析和吸纳,对于网民来说,地方政府单向通知的内容似乎依然是一种决定后的僵硬通知,缺乏公众意见的代入感,难于让网民接受。因此这次信息沟通不但没有使公众感受到政府的沟通努力,反而进一步使公众质疑政府是否有让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诚意;(3)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公众信息能力不对称。政府匿名发帖后其内容立刻被网友发布的质疑信息所淹没。与传统媒体主导传播的时代不同,新网络媒体时代公众获得信息通道繁多,信息内容更为全面多样,而网络新

媒体又为网民提供了集体交换积累信息和力量集结的平台,使网民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拥有强大的信息后盾,从而使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显得较为苍白单薄。

同时新网络媒体作为“第三空间”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沟通渠道控制和人际网络的信息流通限制,为网民群体交互互动提供了实时意见协调统一和力量集结的空间。^{[11][12]}网民在与政府网下互动和网民间网上互动的过程中慢慢清晰定义了环保运动的主旨,最终确定了运动方式,实现了网民意见的统一,提供了运动从网上走向网下的参与基础和指导准则,给地方政府的治理应对提出了极大挑战。

进入了网上网下融合(风暴眼)阶段后,抗争者网络上下力量的融合使地方政府疲于应对。从2012年6月开始,环保运动者不仅加强了网下宣传,通过与面对面交互、传单散发,以及与政府正面对话联合更多的网下公众(特别是老干部),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环保运动者在网络上的宣传主动性越来越强,产生了传播学上的“跨媒体效应”。也就是说,环保主义者的宣传从早期“慧聪环保网”的单向专门(环保专项)频道的宣传,进入到网上网下同时宣传,再通过“凤凰网”(公共频道)的放大传播进入公众视野,从而使公众产生了解运动始末的信息需求。这一需求又反过来迫使主流媒体进行同步传播,引导了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质检网、商都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财经网等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方向。

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面对前期网络媒体沟通失败和各方压力,加大了与公众的交互力度。2012年6月18日地方政府组织了各方参与的交流沟通会,但是这次沟通中地方政府依然没有准确把握沟通契机,无法接受以老干部为首提出的建议。此外,地方政府请来的与会专家又无法回答公众对政府公开数据和立项决策的质疑,只单方面强硬期望公众接受政府决策,使得各方的交流协商可能更加渺茫,沟通无法进行,并最终导致环保运动者放弃沟通努力。这一结果,也标志着政府丧失了风暴眼中的最后一个机遇,使这场风暴愈演愈烈。沟通会不久,环保主义者旋即递交了示威抗议申请。

网下抗议示威爆发,抗争运动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政府一直不愿发生的最后阶段。政府的僵硬的处置手段既无法阻止抗争者通过网络和新社交媒体进行抗争运动的协调和沟通,更直接导致了示威的爆发。针对环保主义者聚集的“启吾东疆”,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网络删帖和封掉网络账户等强硬手段限制环保运动者的意见交互和协商,同时致信主要媒体请求不要报道这一事件或删除已发报道。事实上,这些处置方式根本无法阻止环保主义者通过QQ群、天涯等其他主流网络论坛以及社会媒体和微博进行意见实时交换和行动协调,反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弹。

此外,针对公众不间断的信息公开和抗议示威申

请,地方政府更多是置之不理或拖延处理,不断刺激公众进一步加大网上沟通交流的欲望,加深了对环保运动的依赖。而当2012年7月28-30日抗议示威消息网上传出后,部分企事业单位更要求职工签署不要参与抗议示威行动的保证书。很多启东公众表示之前不知道这个环保运动,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使得他们开始对运动好奇或者寻找相关信息,无形之中扩展了运动的影响力。因此,尽管启东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7月26日发布了《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表示正在对项目重新评估,呼吁大家不要参加抗议示威。但为时已晚,网上网下行动的协调统一已经完成,风暴酝酿完成,示威最终发生。有意思的是,这一视频后来被诸如人民网、中国新闻网、财经网等十多家传统主流媒体大量传播发布,最终帮助环保运动者实现了从网络媒体——专门环保网络媒体——主流公共媒体——主流权威媒体的跨媒体完整宣传路径和宣传效应。

三、启东事件及其处理的启示

启东事件表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抗争与此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传播路径上的差异,更体现在网络新媒体在整个酝酿发展过程中作为新的信息交流教育通道对于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作为新的协商空间对网民力量集结的强大作用。此外,网络新媒体还挑战了传统媒体传播的主导地位,打破了传统官僚制治理的核心基础,给现代地方政府的公共事件治理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机遇。而只有从管理和能力建设、技术手段发展以及治理理念和制度化建设等多个层面上建设现代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地面对这种挑战,实现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3]

从管理和能力建设上,我国地方政府目前对网络新媒体支持下的抗争运动治理能力明显尚待提升。网络和新媒体作为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渐渐地威胁着传统媒体信息传播主导地位。在这一新传播渠道中,传统多由政府官员扮演的权威信息发布角色慢慢被任何公众都可以担当的早期预警者角色取代。因此,应构建迅速应对这一挑战的地方治理能力体系,巩固政府公信力,保证对公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将是我国大数据时代到来后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同时新的抗争运动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明细的治理结构、清楚的运动章程以及固定的基础设施。相反,新的抗争运动以事件为核心,依托网络和新媒体缓慢扩张,形成以“议题”为核心的“轻社区”。因此在新媒体支持下形成的“轻社区”以其开放性、灵活性、非正式、非长期、可辩识性低、束缚力小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公共事务管理参与意识日渐增长的中国公众的青睐,也成了抗争者最常选择的推动抗争运动的交互方式,为新环保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意见协商和行动协调工具和群众基础。跟踪轻社区的建立发展,分析识别早期网民关注热点、轻社区形成机制和网民意见统一

和行动协调驱动因素、争取类似事件治理的主动、实时了解公众需求将是未来我国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前瞻性治理抗争运动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手段上,大数据时代,政府决策时面对的不再是信息匮乏问题,如何在海量信息和公开数据中,识别公众早期自我反思阶段的信息需求并进行针对性的信息公开;如何在网上公众集体反思阶段了解公众公共事件治理的需求和愿景,结合地方发展实践和需要,制定良性长效的公共政策,从而在提升地方经济发展实力的同时,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良性政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风暴眼形成前,制定快速有效的公共事件治理措施,在危机爆发之前,通过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和信息公开,赢得地方治理的先机,都是我国地方政府在未来发展自动化的信息分析手段的关键。

从治理理念上来看,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领导主要精力多投放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关注外部投资引入和区域的GDP发展。而面对我国公民逐渐发展成熟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则缺乏通过与公众互动、吸收意见来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理念。在自媒体主导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传统的领导人主观决策—单向通知—缺乏沟通的僵化的理念和治理模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地方政府对新媒体作为信息分享的强大平台所具有作用的忽视,没有意识到新媒体传播情况下政府权威信息传播者地位的削弱,更来自地方政府领导人在治理公共事件上缺乏与公众沟通并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的常态化意识,依然寄希望于政府的单向强硬通知、公众照单全收的传统治理理念。因此,网民和公众通过社会媒体进行的意见沟通和行动协调与这种传统治理理念的碰撞也就不可避免。①

【参考文献】

- [1] Matthews, Fred H. *Quest for an American sociology: Robert E.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McGill -

Queen's Press - MQUP, 1977.

- [2]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 [3] Cohen, Burton H. Recall of categorized words lis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63, 66(3).
- [4] Converse, Philip 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in David E. Apter e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206 - 261.
- [5] Converse, Philip E. Attitudes and non - attitudes: Continuation of a Dialogu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1970, (168).
- [6] Simon, Herbert A.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 1972, 1(1)
- [7] Marcus, George E., et al.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Impact of Extrinsic Anxiety o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Tolerance Judg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5, 26(6).
- [8] Neuman, W. Russell. *The Affect Effect: Dynamics of Emotion in Political Thinking and Behavi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9] 钟伟军.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 [J]. 2013(10).
- [10] Noelle Neumann, Elisabeth.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4, 24(2).
- [11] 谢金林.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 - 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1).
- [12] 谢金林. 网络空间草根政治运动及其公共治理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1).
- [13] 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10).

(责任编辑 尚璇)

Governance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Age of Big Data—An Analysis of Qidong Case in Jiangsu Province

Liu Shuhua

[Abstract] Social movement takes a very different for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It doesn't have a stable structure, nor does it employ ideology to strengthen bounds among members. Members of social protest communicate with strangers virtually based on self-interest. Once agreement is reached, members tend to take actions offline. The movement quickly dissolves once deliberation completed and issue resolved. These introduce huge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China.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Qidong case of social protest before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and governance are made. Conclusions on critical issues to be addressed for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are presented in the end.

[Keywords] big data, national governance, network protest, network crisis management

[Author] Liu Shuhu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